

红色
聚焦

中共

畅销书

龙虎

榜

见证实录

主编 / 王太岳 周继强

西藏人民出版社



红色聚焦

中共

畅销书

龙虎榜

ZHONGGONG LONGHU BANG

ISBN 7-223-01359-1



9 787223 013598 >

ISBN 7-223-01359-1/K · 140

定价：4980.00 元（全十六册）



见证实录卷

(三)

西藏人民出版社

见证一九二九年的瞿秋白

1927年，决定中国之命运的1927年，倒退与前进，黑暗与光明，压迫与反抗，国民党与共产党，泾水与渭水……一面是背信弃义、叛变，一面是英勇牺牲、抗争……革命转入低潮。低潮在暗中汇聚一切潜流，掀起惊涛骇浪的日子终将来临。然而，现在却沉滓泛起。

1927年，是考验瞿秋白的一年，是瞿秋白向金字塔顶奋力攀登的一年，很难设想时年28岁的本传主人在这决定中国命运之年的思想准备。

1927年，到处是革命的血……

2月，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失败。

3月6日，赣州发生惨案，蒋介石唆使特务暴徒杀害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16日，蒋介石派武装部队扫平南昌市的国民党左派党部；第二天，龙江发生“三·一七”惨案；23日，又发生安庆惨案；24日，国民革命军攻克南京，当夜停泊在长江下关江面上的英、美、日、法、意等国军舰炮轰南京，造成死伤两千余人的“南京惨案”。五、六个帝国主义军舰上雨点般飞入石头城的炮弹为谁的事业鸣炮开道？当南京的国民革命军和无事百姓淹没在血泊中的悲惨时刻，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行列的郭沫若愤怒了，挥毫写了一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全文第一句话是：“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真是不幸而言中——

在上海，失败于二次武装起义的工人在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和罗亦农、赵世炎等领导下于3月21日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收复了被直鲁军阀控制的上海。当时在武汉的瞿秋白听到消息后异常兴奋：“我们应当感谢恩来、亦农、世炎同志等，我们更应该感谢上海的工人阶级。是他们在上海的上空，树起了红旗，为我党添了光辉。”工人的英勇战斗和共产党人的卓越指挥是该感谢的，但历史却仍然走向它前进的反面：26日，沉浸在胜利声中的上海工人武装迎来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同时迎来的却是1927年最悲惨的一页。浪漫主义诗人倒是具有敏锐的政治嗅觉！当然到了1927年的3月，右倾机会主义的陈独秀即使一旦觉悟，也无法挽回蒋介石倒戈反共的局面了。4月12日，刚刚插上的红旗被砍倒，工人和共产党人的鲜血宣告上海已被新军阀占领。3天后，鲜血流到“革命策源地”广州，国民党和共产党终于——但是还没有最后——破裂，因为宁汉合流的一幕尚未演出。

1927年是1935年的前兆，这两个年份都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又一个时代的开始，1927年的革命的血埋葬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彻底破裂的前夜

中国革命在生死存亡中游移，瞿秋白站了出来，他有思想准备吗？他可曾想到马克思喜爱的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的一句名言？

在这里要放弃一切猜疑，
在这里要消除一切怯弱。
——但丁《神曲·地狱篇》

“武汉时代的前夜（一九二七年初），我正从重病之中脱险。将近病好的时候，陈独秀、彭述之等的政治主张，逐渐暴露机会主义的实质，一般党员对他们失掉信义〔仰〕。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上（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间），独秀虽然仍旧被选，但是对于〔党的〕领导已不大行了。武汉的国共分裂之后，独秀就退出中央。那时候，没有别人主持，就轮到我主持中央政治局。”看来，“轮到”瞿秋白主持党中央这个压力实在太过重大太偶然了。但是，我们没有忘记马克思的一席话：“如果斗争只是在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末世界历史当然就非常容易创造了。另一方面，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活，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段话，仿佛是专为在复杂的事变发生之期带有极大偶然性被拥上领导岗位的瞿秋白所写，这似乎也有点儿“偶然性”。考其究竟，是因为马克思在研究法国 1849 年 6 月 13 日巴黎山岳党人开玩笑似的“革命”示威，对比 1971 年 3 月 18 日巴黎公社无产阶级革命异同时，讲的这番话所具有的历史背景，与 1927 年的中国国共两党联合“国民革命”很快被伙伴的国民党淹没在血泊中，从此无产阶级开始觉醒，从此开始“全靠自己救自己”

瞿秋白（1899—1935），江苏常州人。192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



的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1871—1927 巴黎——上海，时代不同，地点不同，但工人阶级血流成渠的历史教训是相同的。法国，为了抗击普鲁士入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采取了联合行动。当事态发生剧变，向有利于资产阶级方向发展而资产阶级倒戈屠杀无产阶级时，无产阶级就拥出自己的领袖来领导新的独立的革命。笔者认为，既然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有了马克思总主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已经成为各国无产阶级的共同口号，在研究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史的时候，都应当从宏观的角度——也许可以说是用“全球观念”进行比较研究。这是一种值得

尝试的新方法论。我们把1924~1927年国共两党从合作到分裂,与法国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多次联合多次分裂,而每一次都是以无产阶级失败而告终的教训,予以比较研究,是符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发展规律的。请允许我们在提出这一方法论研究1927年中国发生的国共分裂的历史时,引用恩格斯于巴黎事变20年后——1891年——为马克思的辉煌巨著《法兰西内战》写的同样是辉煌巨著的《序言》中的一段话:第一,看看1927年卧在血泊中的中国阶级兄弟能否在巴黎工人血泊中获得一些再革命的教训和经验;第二,看看我们提出的研究方法的可行性。具引如下:

由于法国从1789年起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的结果,近50年来在巴黎发生的每次革命都不能不带有无产阶级的性质;这样,无产阶级每次用自己的鲜血换得胜利之后,总是提出自己的要求来。这些要求每次都依巴黎工人的发展程度而不同,多少模糊不明,甚至混乱不清;但是,所有这些要求归根到底都是要消灭资本家和工人的阶级对立状态。至于这一点如何才能实现,的确谁也不知道。然而,这一要求本身,尽管很不明确,对现存社会制度已经含有一种威胁;提出这个要求的工人们常常还是拥有武装的;因此,掌握国家大权的资产者的第一个信条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于是,在每次工人进行革命以后就产生新的斗争,其结果总是工人失败。

历史真是有惊人的相同之处,所不同的是巴黎工人与资产阶级合作多次,而中国工人仅只一次。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斗争胜利直接威胁着“掌握大权的资产者”,于是马上就发生武装倒戈反共的四月事变。1927年4月12日的上海重演了1871年巴黎五月流血周的惨剧。1925年1月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所作的《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的第5条《我们与国民党及其他党派之关系》中,曾经正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国民党自改组大会之后,左右派之分化已成事实……左派的成分是工人、农民及知识阶级中的急进分子;右派的成分是军人、官僚、政客、资本家,他们在广东已和大商买办阶级及地主阶级合作,压迫农民、工人”这份有瞿秋白参与的议决案,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参加的党代会上,对于“国共合作”后出现的新的阶级分化写的是正确的,但是一方是无权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一方是有权的军人、官僚、政客和资本家,通过这种对比所显示出来的右倾、镇压革命、合作破裂的危险的前程却没有引起重视,因而缺乏足够的警惕性,终于发生了恩格斯说的“解除工人的武装”的悲剧在中国重



1925年6月4日，中共为加强五卅运动中的反帝宣传，创办《热血日报》，由瞿秋白任主编。

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导师的总结真是具有科学发展的普遍意义。“国共合作”，共产党人加入了国民党，甚至在国民党在国民政府中获得了一些席位，但是，权力却操纵在“军人、官僚、政客、资本家”的手中，合作是注定要失败的，当然这是就其阶级性来说的。问题自然还出在中国共产党内在合作中的主导思想——现在来分析这个问题当然是明确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但是在当时，正如恩格斯说的：“模糊不明，甚至混乱不清”。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中写到中共“五大”的时局时说：“中国革命到了五卅之后，已经开始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而现今的北伐的革命战争事实上是五卅运动之直接继续，从群众的反抗示威，抵货罢工，进一步而至于更高的斗争形式——武装的革命战争。”^①这是对当时层层上升的革命斗争的具体描述。但是，由此而进行分析，

预测未来的发展，却陷入了——且慢说是“左倾”，至少是过分乐观了：“实际上，五卅运动的一九二五年，中国革命不仅相对的进入了新的阶段。并且，开始从远东方面动摇世界资本主义之稳定；等到北伐战争进占了长江，革命的发展就已经日益接近决死的斗争，他负着掀起世界革命之第二次巨潮的责任——继续俄国的十月革命。”^②这是不是有点儿“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其功于一役”的味道？能成功吗？瞿秋白在写上述这些时，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刚刚失败啊！看来，瞿秋白的勇气实在是非常之大的。但是，人们不禁要问一声：这与“五大”《我们与国民党及其他党派之关系》中分析的“左右两派之分化已成事实”，这个“事实”确确实实已被右派所掌握相符吗？（孙中山先生于3月逝世对于国民党右派势力又是一个巩固其反对国民革命和反共的偶然事件）。再则，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北伐战争能导致“继续俄国的十月革命”吗？真是又一次的“模糊不清，甚至混乱不明”。当然更其“混乱不明”的还在于结论：“而且中国的革命方式，联合国民革命与社会革命，由劳农之民权独裁制宜达社会主义独裁制的新方式，将要是世界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群众革命创制，可以成为世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之范式。”^③这段话中有一个词“独裁制”在本书以前的章节中曾经多次出现过，这里就容得着解释一下了。这个词

实际上就是现在的专政 dictat” rshiP,就是在早期政治书刊上常出现的“狄党推多”(dictator)。由“劳农之民权独裁制”(即新三民主义的国民专政)而能“直达”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尤其是在今天看来真是够“混乱”的。共产国际从倾向欧洲和美洲的工人运动转而倾注远东革命,提出殖民地人民革命联合民族主义政党的政策纲领,全部的实际工作的成绩就是中国革命的“国共合作”。这么一说,瞿秋白的北伐过长江导致中国革命肩负“世界革命之第二次巨潮”,“继续俄国的十月革命”乃至认为中国革命是未来殖民地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范式”,就一点也不必奇怪了。假如说1925年“中国革命之伏流昂进”,使中国共产党人乐观于“国共合作”北伐顺利的时局而产生一些过“左”的意念,那么,7月廖仲恺被刺突现出来的右派杀手,戴季陶主义的右派理论,西山会议派的右派组织,直到1926年“三·二〇(中山舰)”事件蒋介石开始暴露……早已得出国民党“左右分化已成事实”的中国共产党却真的失去了警觉。当然,这一切与共和国际的指导、指示和领导是有直接关系的,直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1926年11月至12月16日)——这是开在国民党右派潜流暗中汇聚起来开始向左派和中国共产党决裂的前夜,国共分裂前的最后一次共产国际会议——由于各国代表一再向中国革命致敬,中国代表谭平山在12月2日的会议上还宣称:“我认为,现在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已取得的胜利,并进一步取得成就。由于广州军队军事上的胜利,中国的革命力量日益聚集起来,而反动力量则越来越涣散了。”“反动力量”指的是军阀,频于失败是对的,但是革命力量“日益聚集”,则显然是绝顶的错误。斯大林在这次执委11月30日会议上有一个长篇发言决定了1927年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他分析中国革命的政权性质时说,现行广东国民革命政府“将是中国走向非资本主义发展,或者更确切些说,走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政权。”因此,他指示:“中国共产党人现在退出国民党将是极严重的错误。中国革命的全部进程、它的性质、它的前途都毫无疑问地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应当留在国民党内,并且在那里加紧自己的工作。”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作出的《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的第4节《共产党和国民党》几乎只字未改地引述了斯大林要求中国共产党继续留在国民党内的指示。在这一节中,斯大林倒是道明了一个严重问题:“自从广州政府建立以来,实际权力掌握在国民党右翼手中(六个委员中五个属于右翼)。”这是1925年1月中共四大《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决议》中相关内容的信息反馈。就此还提出三点要求,即反对国民党右派和戴季陶主义;联合国民党左派;批判并把中立派拉过来。显然,共产国际是要保护民族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解放运动旗帜,以便引起连锁反应而爆

发世界革命。60年风风雨雨，时至今日，无产阶级的这一理想还没有实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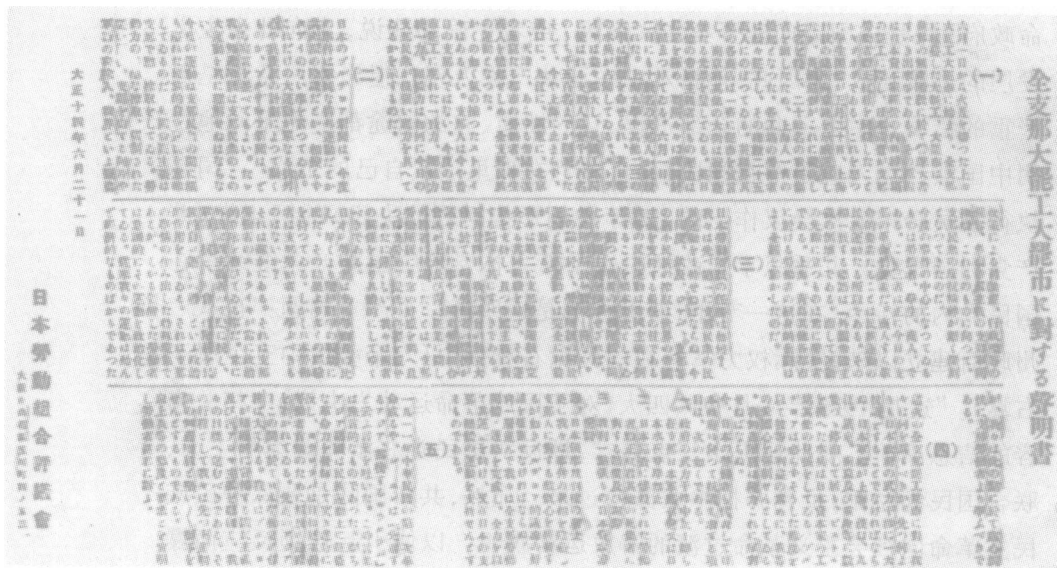
正由于1926年11月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和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下达到中国，使处境已经相当困难的中国共产党再一次强调“国共合作”，军委书记周恩来于12月10日、11日和17日连续写了3篇论文强调团结：“国民党……以至C.P和C.y都应该毫无迟疑地相互了解地努力联合”当然危险不出在联合上，而出在“努力联合”中有国民革命军北伐总司令蒋介石集团。

中共北方局书记李大钊于11月发表《中山主义的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指出：“中山主义所指导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亦必要影响到英国，经过英国影响到欧洲，到全世界。马克思和列宁的话，必能由中国民众的革命的努力经由中山主义的道路一一证实。”李大钊的这番话理论上是不对的，只是极言其对国共合作的诚意和对中山先生的敬仰而已。

历史终于一步跨进了1927年，新正刚过，围绕着列宁逝世三周年纪念，又是一片团结、联合、了解和友谊。陈独秀当然已经右倾，自不必说。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维经斯基（魏琴）发表了《列宁论东方民族的解放》，文中引用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决议中的结论。权威已发言强调国共合作，一切就这么决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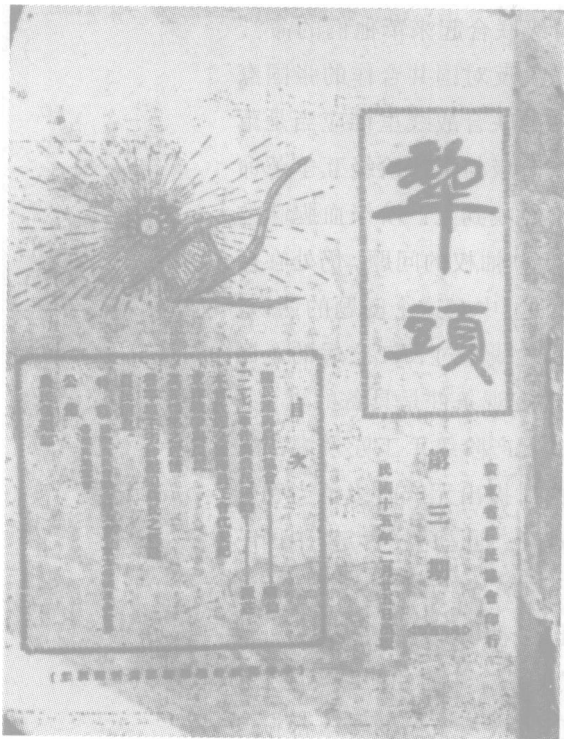
国共合作，就中国革命20年代南北分权、军阀割据、“国将不国”的局面而言，是可行的，中国共产党有必要团结国民党和一切进步势力反对军阀，反对支持军阀的帝国主义。正是在这一点——也许应当用比较严密的语言说是局限在一定时空范围内的这一点——上结成了同盟。瞿秋白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问题：“中国是谁革谁的命——是无产阶级单独

日本劳动组合评议会
印发的声援中国五卅
运动的传单



革帝国主义、买办阶级的命,还是各种被压迫阶级联合起来革他们的命?”回答肯定是“联合起来”。这在1926年上,连坚决反对国共合作的张国焘大概也不至于再否定的了。问题出在“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里谁应当是革命之领袖阶级(Class-Hegemony)?并说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互争革命之领袖权(Hegemony)的意义。”遗憾的是,在已经嗅到无产阶级血腥味的1927年初,关于领袖权的问题,特别是无产阶级领袖权的问题,仍处在模糊不清的阶段。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中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在当时大概可以认为是最正确不过的。他认为,北伐军过长江之后的全国形势,“争取无产阶级对于国民革命的领袖权之客观条件是具备的了,必须主观上明了这一革命中的战术计划,应当以无产阶级手工匠及农民的联盟做进攻治者阶级的主力军。”但是,瞿秋白对提出无产阶级争当领袖权的“客观条件”(北伐革命形势)估计得太乐观了,他是这样肯定“中国革命现时的阶段”的:“(一)绝对大多数民众在五卅之后与帝国主义及治者阶级决然的破裂,……(二)国民政府的北伐已经征取了半个中国……成了反帝国主义的政治中心,已经组成政府形式的革命中心;(三)不但工农无产阶级扩大深入自己的阶级斗争,而且手工工人及农民的斗争都掀起巨大的革命潮流……”在这种乐观估计下的无产阶级争领袖权的“战术计划”是注定要失败的。

如果我们暂不论“国共合作”的得失,单论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和组织策略,瞿秋白下面的论述是正确的,“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遇着革命怒潮,都会发生这一问题。所谓组织策略,就是是否应当分裂还是合组各派问题。中国革命不但与俄国一九一七年不同,就是与俄国的一九〇五年也不同。”瞿秋白的意思是,中国目前进行的国民革命,既不是纯然的资产阶级革命(1905年的二月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1917年社会主义革命)。这里的内涵就是资产阶级的新的民主主义革命,“现在中国的革命,却是为着世界的社会主义建设,而解放资产阶级的中国(并非中国之资产阶级)。何以是解放资产阶级的中国,而不是直接实行无产阶级独裁制的革命呢?因为(一)中国经济发展的程度(客观条件)和(二)无产阶级之大多数群众的组织及觉悟程度(主观条件),使纯然的无产阶级革命还不可能;所以革命的最近目的,并非夺取政权实行最大限度的党纲,乃是参加政权实行最小限度的党纲。”这里就更清楚地表明了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最小限度的党纲(最低纲领)——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最大限度的党纲(最高纲领)——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之所以成为国共合作破裂前最后出现的一篇代表着当时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重要文献,原因就在于瞿秋白在这部论



广东省农民协会机关刊《犁头》

著中,每涉及到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对中国社会进行剖析时,其得出的结论往往是比较强的生命力,也就是通常说的普遍真理性质。但是,一提到如何实践这些理论,使其成为革命的物质力量,转化为武器的批判,就受到实现主张时的各种条件的制约。当时最大的制约,依我们今天的观念也只能说到受国民党右派势力破坏国民革命、践踏作为中山先生遗嘱的三大政策所导致的1927年四月事变。当然,还应当加上莫斯科共产国际遥控指导上的失误。这种失误在较大程度上是反馈的信息源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观失误,和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的政治素质、性格和应变事态的指挥艺术等的不足。例如对于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在龙江、南昌和安庆多饮

生的反共事件的妥协,就是明证。这些明显破坏合作和钳制共产党的行径造成了中国革命的大滑坡,而党内没有足够的权威制止这些错误,更没有渠道向莫斯科反映逐渐抬头的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的日益猖狂的反共分裂活动。中国共产党也好,共产国际也好,似乎都在等待“四一二”蒋介石反共倒戈。只有到了绝境,才可能回峰路转。革命,有时是一种期待;当然往往是充满着流血的惨痛教训的期待。待到中国工人及其先锋队共产党人躺在冰凉的大地上时,才使共产国际及其驻中国代表开始——仅仅是开始——转变对国民党的看法。我们说“仅仅是开始”,是因为从“四·一二”蒋介石叛变,到“七·一五”汪精卫叛变3个月又3天时间内还在继续右倾。本书不具有研究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指导的成败得失的任务,但是关涉到进入本书的时局和人物命运时,就有提供背景资料加以叙述的必要。从这个立传原则出发,令人感到奇怪得几乎近于反常的是,宁汉合流之后,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革命当前形势的决议(1927年7月)》中,一方面声讨蒋介石声讨武汉政府,说武汉政府“现在已成为反革命力量……成了反革命势力的帮凶”,一方面竟然还要求维持国共合作:“共产国际认为,以下各项必须做到:(1)中国共产党人毫不迟疑地退出武汉政府,以示抗议。(2)……揭发武汉政府的路线政策。(3)不退出国民党。”而且还要求再做国民党的基层工作,发动自下而上的“坚决抗议国民党中央倒行逆施”的行动,并要求就此作出“决议”,撤换国民党现领导,

“在此基础上准备召开国民党代表大会”。甚至还指示：“尽管国民党领导大肆排除共产党人，仍要留在国民党内。”人们不禁要问：宁汉合流，蒋介石一统天下的国民党政府行将在南京挂牌整肃中共和全国之时，中国哪里还有一个“国民党”可供共产党去“留下”或“不退”呢？回忆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鲍罗廷参加，中国共产党人吴玉章、董必武、毛泽东、恽代英、周恩来、林伯渠、陈延年等参加，左派声势浩大，合作气氛浓厚，还作成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宣布开除谢持、邹鲁等大右派，警告了一些小右派。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未来宁权合流的汪精卫和蒋介石被选入中央执委，而后蒋介石则很快控制了局势。到了5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在国民党最高领导层第一次暴露他蓄谋已久的反共纲领《整理党务案》，这向右的一步远远超过西山会议派，但其后果却出乎想象，竟然受到作为最高顾问的鲍罗廷的认可。然后马上成立有蒋介石在内的5个国民党对付瞿秋白、谭平山和张国焘3个共产党的国共联席会议。问题还不在于数量上的5对3，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共产国际的让步政策成全了蒋介石。联席会议之前，蒋介石已当上了国民党中央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党政军大权早已落入右派手中。中国共产党方面呢？共产国际首席代表的让步政策决定了中共的走向，总书记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除了他本人应负政治上的责任外，不能不指出还与共产国际把蒋介石当成了一种可以依靠的力量有关。不然是不会在“三·二〇（中山舰）”事件之后还把党政军大权统统交给他的。这么一回想，共产国际七月决议作出仍然“必须做到”共产党人“留在国民党内”就不足为奇了。即使在宁汉合流之后，真地存在一个“国民党”，再重复开除几个右派的作法，已经丝毫无损于蒋介石的反共大业了。在中国从来就是权从枪出，“自下而上”也罢，国民党会议也罢，枪声一响，什么也销声匿迹了。

共产国际七月会议对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重大震动。这是共产国际自三大以来用决议的形式第一次对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提出批评，而且是极其严厉的批评：“最近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现领导犯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性错误”，“党的个别领导人还提出了明显的机会主义口号”，“共产国际认为，必须立即纠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错误”。只差没有点出“现领导”陈独秀的名字。其实，“七月决议”下达到中国时，中共五大已经开过了3个多月，仍然被选为总书记的陈独秀已经不管事了，这时他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亦已经结束，取而代之的一群年青的共产党人正在筹备武装起义了。

瞿秋白就是在这个形势严重而又复杂——这时党外已不复杂了，复杂的是党内——的革命转捩点开始攀登金字塔顶的。

必要的回顾

历史,已经发展到了 1927 年,又处在朋友即将变敌人,兵刃相拼之时,瞿秋白被国共分裂和党内右倾导致的一系列严重问题缠身而弄到焦头烂额,几乎是被“逼”挑起领导重担,他自己又觉得非常地“不合式”之时,你,传记作者竟还有心思回顾?!

传记读者,且莫着急。回顾过去正是为了将来,磨刀不误砍柴工。我们在前面曾经提到马克思对偶然性在历史创造中的作用,这里就用得着补充一点恩格斯的看法:“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隐藏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这段话引自恩格斯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名著之一《路德维布·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终结”就是开始,回顾已经“终结”的过去,为的是从中获取即将开始创造的历史教训。你瞧,处在上海第二次工人武装起义的紧急时刻,瞿秋白在干什么?可以说是在枪炮声中回顾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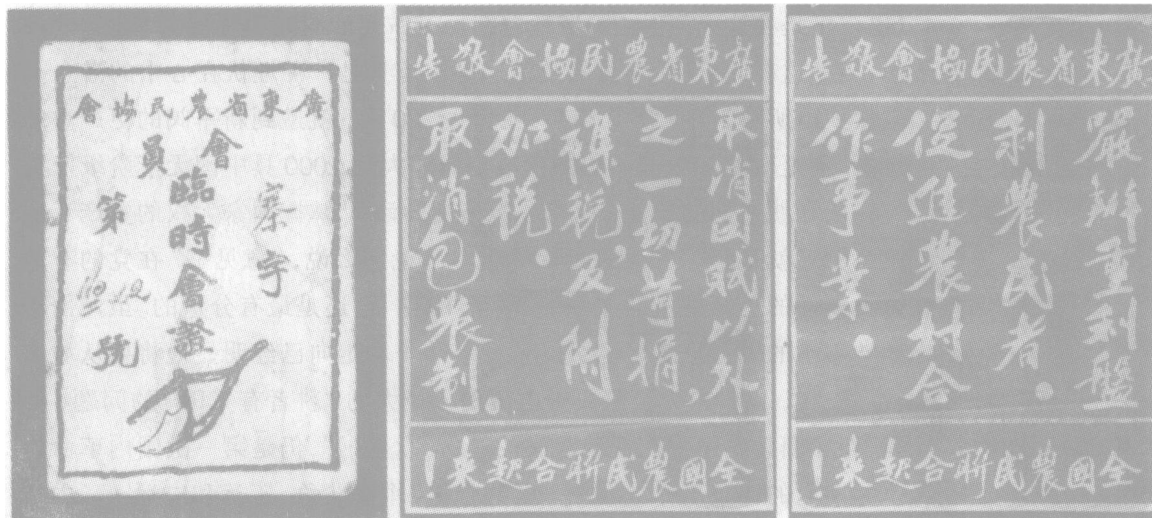
1927 年 2 月 17 日,瞿秋白在紧张地编一本著作集,就是《瞿秋白论文集》,把他 1923 年 1 月从莫斯科回国之后所写的几乎全部署名文章编在一起,分成八个大类,这是瞿秋白在即将离开上海去武汉的紧张时刻,第一次全面总结自己运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在中国实践“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的得失。这样做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我现在收集四年来的著述付印,目的是在于呈显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用革命理论于革命实践上的成绩,并且理出一个相当的系统,使读者易于找着我的思想的线索。固然,无产阶级之革命思想的指导,当然是集体的工作,然而我确是这集体中的一个个体,整理我的思想,批评我的思想,亦许对于中国革命的实践不为无益。”看来,瞿秋白已经预感到风暴即将来临,在迎接风暴的前夕,回顾是必需的;有时,回顾也为的是向过去告别。

历史:……

果然,3 天后,2 月 20 日,难以预测的历史终于开始布上阴云。这一天,瞿秋白匆忙赶到辣斐德路辣斐坊(今复兴中路复兴坊)第二次工人武装起义指挥所,参与由中共中央军委(军事部书记周恩来直接指挥的决策研究。起义于 20 日下午 5 点 50 分由停泊在高昌庙黄浦江面上同情革命的建康、建威两艘军舰向沪西发炮开始。由于预定接应起义的国民革命军驻嘉兴的白崇禧部拒不出兵,加上起义领导指挥失调,24 日起义就以失败而告终。当夜,瞿秋白立即写成总结这次起义失败的《上海二月二十二

日暴动之后政策及工作计划意见书》，在这篇等于是在战壕里写成的“意见书”中，实际上已经是在向金字塔顶攀登的瞿秋白写道：“我意党对于二月念二日暴动，应公开承认此‘事前未及早准备’之错误及中央自二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晨之政策动摇不定与疏忽而不周到之错误。”

第二次武装起义失败的教训是严重的。这就要好好总结教训，因为四个月前已经失败了一次——1926年10月21~24日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的教训应当说是够惨的了，而第二次失败与第一次有比较相似之处，只是显得准备得更仓促而几乎没有形成高潮，造成威胁，因此失败得更惨，工人的血流得远远超过第一次起义，成了孙传芳及其屠手上海防守司令李宝章最后一次，亦是北洋军阀彻底覆灭前在上海的最后一次屠杀。。接着，上海就成为即将抵达的新军阀开杀戒的第一个屠场。人民的鲜血激怒了瞿秋白，这是他一生第一次目睹生灵涂炭的惨象。被枭首挂



广东省农民协会
印发的宣传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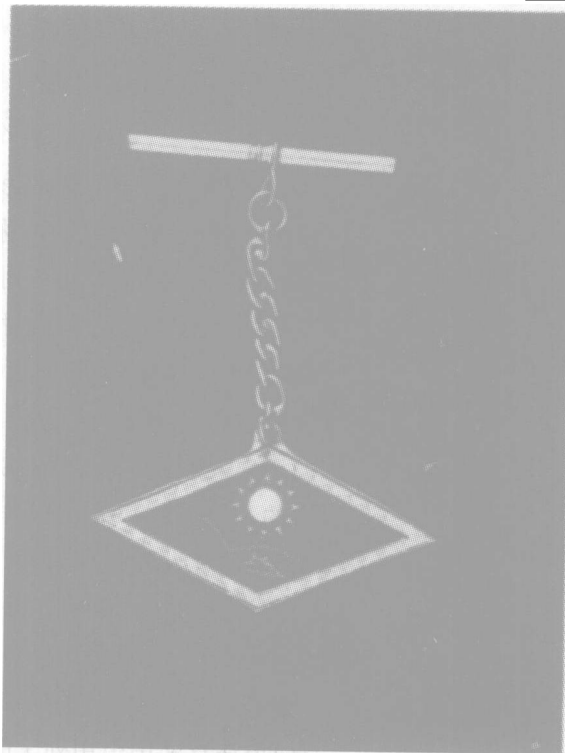
在起义现场的工人兄弟的头颅，控诉着中国的黑暗和残暴，但也象征着对两次起义失误的抱怨。军阀反动派以屠杀人民扼杀革命为业，应当总结教训的正是以号召人民发动革命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意见书”尖锐地说明了瞿秋白的悲愤情绪和坦率的无保留的批评：“尤其重要者为罢工之宣布既未由党正式决定，罢工之后又不视此次罢工为暴动之开始，小资产阶级之中国绝未有政治宣传，甚至工人群众之中至今对于罢工之目的尚大半莫名其妙，且所发口号近于欺骗群众（二十二日下午已发出暴动命令，部委尚未遵照中央及区委之口号，而自造北伐军已到北站之谣），再则政治口号上虽已决定‘市民代表大会’，然未确认此为行动口号——即立时号令各厂各工会工人选举代表，设法鼓动小商人群体代表来参加此会：‘临时市民代表大会’（国民革命的苏维埃），使成一同讨论罢工罢市一致武装‘自卫’以至于暴动的行动机关，——换言之，即形成事实上之临时

革命政府”，“此外，二十一日午夜所决定之暴动计划既未周顾群众的武装斗争意志，又未设定主力军之创造及有目的的作战计划。”写到这里，不禁使人们想起 1926 年为准备上海工人第一次起义所作的大量舆论工作中瞿秋白的一段话：“抛弃一切改良妥协的幻想，决然以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国主义对于中国人的一切统治，在上海便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双重市政府。”看来，从第一破起义时，中国共产党就有工人起义，北伐军接应，孙传芳控制的市政府被推翻等一系列的设想，这是当时政界的地方自治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于是才有第二次时的“市民代表大会（国民革命苏维埃）”的设想。两次起义全都失败，就无法测度这“市民代表大会”的要求是否能实现，是否是过左的设想了。按照当时蒋介石已经下定了倒戈反共的决心，并已组织成功了策动“四·一二”事件阴谋来判断，这先上海自治后与国民革命军联合造成“政府形式的革命中心”，大概是不可能的。（也许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瞿秋白在反对右倾的同时表现出了“左”的倾向，当然这在 1927 年 2 月的政治局势中还只是一种埋伏在心中的潜念。）果然不出所料，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才 20 天，就遭到新军阀的更严重的打击，甚至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走向。大约 2000 具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和朋友们的尸体，应验了恩格斯的话：“掌握国家大权的资产者的第一信条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但是不论怎么说，“意见书”在党的有关这类事件的总结性质的文件中，截至 1927 年，还是最有分量的。虽然由于急转直下的革命形势，国共破裂，武装斗争的走向已经明显地将要从城市转向农村，以集中力量解决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耕者有其田”的问题，但是，瞿秋白总结第二次武装起义的这份“意见书”，仍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四条工作战线——国共合作，军事斗争，工运和农运——中的工运战线上的一份宝贵的总结，它将成为中国工运史上有关武装斗争的杰出文献而永存。党中央显然也是十分重视这份“意见书”的，在中国共产党党报委员会决定出版瞿秋白的《中国革命战争中之争论问题》一书时作为附录一并问世。“意见书”也证明了瞿秋白面临巨大危险而能迅速作出对策的政治家临危不惧的指挥素质和应变力。如果允许我们讲几句感性的话，《上海二月二十二日暴动后之政策及工作计划意见书》中所表现出来的革命义愤，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的气度，与各种势力斗争的智慧，斩钉截铁的再暴动计划等等，很难想象这是出于一个当时肺病又发作的文弱书生之手——激动而不浮躁，愤怒又不失控；急迫之中的冷静，一团如麻时仍能细心理乱，丝毫不失章法。指挥员应当具备的素质，瞿秋白全部具备了。历史早已翻过去了整整 60 年（1927—1987），重新读一遍“意见书”，仍然令人叹为观止，甚至感到有点不可思议：大概在“时势造英雄”的古训

之外,的确应当加上“英雄造时势”。我们这样说,并把它作为认识瞿秋白的一种见解,是有根据的。正如列宁所说:“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

1927年艰难的2月,在党中央即将从上海迁往武汉,要随迁的繁忙时刻,瞿秋白的一项重大的理论建筑工程,是完成了我们在前面已经多次引用以后还将重点研究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中国革命中之孟雪维克主义)》。这是我党成立以来第一次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全面总结的一部完全可以看作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党史。我们现在是在探讨瞿秋白的理论贡献,从这个角度,如果允许我们作出大胆的——当然不是无根据的——设想,可以认为,

正是这篇巨著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瞿秋白的金字塔的坚实基础,使他成为党的领袖。恩格斯说,重要的是找寻到创造历史的偶然性的“内部隐蔽的规律”,1927年的瞿秋白找到了这个规律,他成功了。对一个党史人物进行研究,也得找寻到这种规律。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上,研究这部文献的形成,正是找到了塑造瞿秋白形象的规律。这部著作是国共合作破裂后的第一次党的全国会议——中共五大的主要的纲领性文件,立即送交莫斯科出版了俄文译本。1年后,1928年4月,中国共产党党报委员会在出版这本著作时指出:“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是瞿秋白同志在第五次大会之前(一九二七年二月)做的。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之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这是第一次比较涉及各方面的尝试。”并指出“即使这书的论断(对中国社会政治及阶级关系之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其中关涉太复杂而详细的问题,还有许多未成熟的思想,不能认为定论”,此书仍然是“一本很重要的历史文件”。可见《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确实是一部奠定瞿秋白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扛鼎之作,我们的大胆设想是合乎历史唯物主义的。但是,现在还不到全面研究此书的时候,现在首先要研究的是瞿秋白所以能写出这部著作的历史的思想和方法论上的原因,为此,我们就应当回到本节的宗旨:回顾。顺着《瞿秋白论文集》显示的理论进程追溯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成功之路。



广东省农民协会证章

两个时间序列

从概率逻辑统观瞿秋白 15 年 (1920~1935) 的战斗生涯, 可以分成两个大的时间序列 (或可称之为系统) 进行编年研究。决定中国之命运的 1927 年正是两个时间序列的历史交替点, 其标志就是《瞿秋白论文集》。按照作者自己的说法, 此书编在“中国历史的轨道正在将转弯未转弯的时期”。我们这样分期, 又以一部论文集作为历史交替点的标记有什么根据呢? 这样分期是否符合传主实际的生活经历和与传主生活经历紧相联结的历史发展规律呢? 我们以为是准确的。先看《瞿秋白论文集》作者《自序》中的一段话: “我们的著作是想要利用于革命的实践的而并非想‘藏之名山, 传请其人’的。列宁说: ‘自傲……与其要革命, 毋宁做革命。’ 我们固然很愿意从事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巨著, 但是在现时革命潮流汹涌的时机, 既不应幻想明窗净几著书的余暇, 那么, 仅只我这些马克思主义的试作, ‘做革命’ 的一部分的成绩之汇集与整理, 也就未始无益哩。” (删节号原有) 请注意文中引用列宁的一段话, 这段话引自《国家与革命·初版跋》。列宁的这部著作写于 1917 年 8~9 月, 还剩下第七章“连一个字也没有来得及写”, 接下去列宁说明了没有写下去的原因是“十月革命前夜的政治危机‘妨碍’了我。对于这种‘妨碍’只有高兴”。再接下去就是瞿秋白引用的话, 今译为“因为做出‘革命的经验’总比论述‘革命的经验’更愉快, 更有益”。十月革命之与列宁, 无论从任何方面都是一个历史分期, 这是不言而喻的。瞿秋白编《论文集》引用列宁的话, 显然也含有这一层意思。1927 年 1 月, 国民革命政府从广东迁往武汉; 3 月, 中国共产党中央从上海迁往武汉, 双方都感到分裂已势所必然, 但都迁往武汉, 都打算在一种新的紧张气氛中, 在一个伪装非常巧妙的国民党右派精粹之一的汪精卫的维持下, 支撑着“国共合作”残局。这么说也许会以为我们在轻慢这段历史, 不是都在说“历史是无情”的吗? 到了 1927 年的 3 月, 还有多少“国共合作”的话题呢?

瞿秋白在工人武装起义失败 (二次) 和成功 (三次) 两造之间和党中央迁址等繁重的事务之中, 他本人也处在发作的肺病刚压下病灶, 安排暂不能同去的杨之华的工作与生活。结婚二三年来虽然时有别离, 但“家”总算稳定在上海未动; 如今, 处在屠夫李宝章实施最后的白色恐怖, 以及国民革命急剧右转的时候, 却要分离, 尽管暂时也少不得担惊受怕, 假如把即将来临的“四·一二”考虑在内, 还真要为成天忙于女工组织的杨之华捏